

张文木：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民族复兴的责任

——读司马光《资治通鉴》随想



•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2019-04-30 08:53:12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https://www.guancha.cn/ZhangWenMu/2019_04_30_499785_s.shtml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文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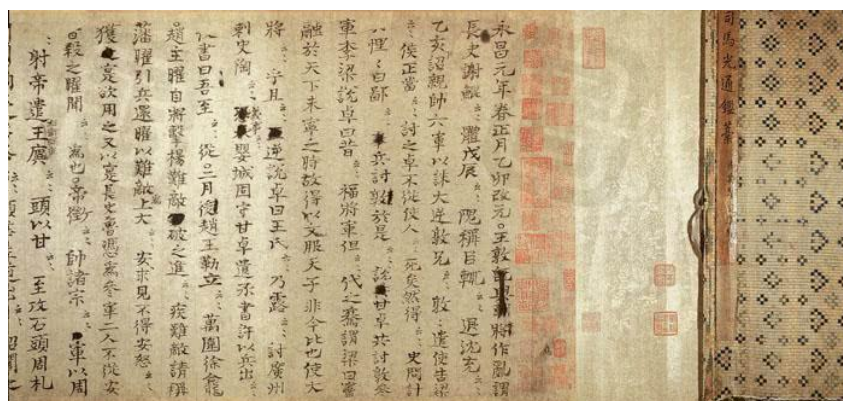
我在2010年年底出版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的自序中，曾说我写前两卷即上、中两卷是在为中国未来经营和治理世界提前做的“资治通鉴”准备。这里我想就《资治通鉴》再多说两句，因为它关乎学风，而学风则关乎国运。

《资治通鉴》出现于北宋（公元960~1127）不是偶然的。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

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这个节点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学者但丁。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同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但丁在开辟着世界的未来，司马光则在挽回已逝的过去。

尽管如此，司马光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黑格尔的作用相似，黑格尔用维护德皇国家体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学笼罩的欧洲意识形态中，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保存了辩证法的思想火种，它最终催生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为世界文明迎来了社会主义前途。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补天”，但其中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则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



司马迁《资治通鉴》手稿（图片来源：网络）

国家多崛起于贫寒，衰败于恬嬉。宋朝世风侈靡，国富而兵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主要是它那脱离实际的浮华学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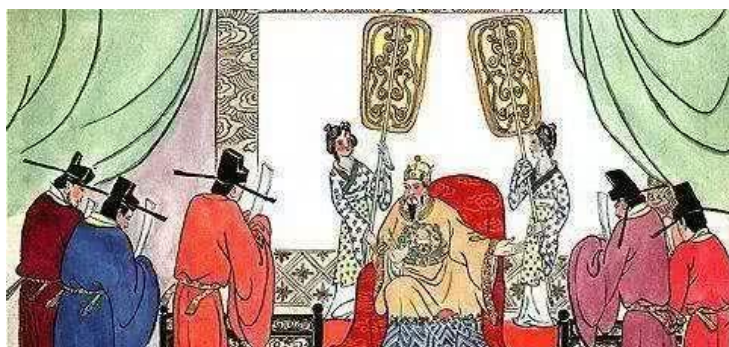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

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

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报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 1362 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缅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



理学的盛行使得北宋朝堂的政治观点流于“空谈”（图片来源：网络）

曾经历南宋灭亡又目睹元朝兴起的史学大家胡三省，对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良苦用心有深切的体会。自宝佑四年（1256 年）开始专心著述《资治通鉴广注》手稿在战乱中散失。宋亡后重新撰写。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 卷）及《释文辩误》（12 卷），注文中多处联系蒙古灭宋事实，发表感慨。他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对《资治通鉴》的深远意义说得透彻：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资治通鉴》在北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大转折的萌动。宋、明这两个富得流油的王朝为北方强势崛起的马上民族所倾覆，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以至南宋的“普世价值”（天理）大师朱熹（1130~1200）也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

与历史上许多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运一样，“四书”被列入国家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中国的思想进步还是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意义。

《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治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式的相对或说无“诚意”的立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论。

此外，《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恢复）。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图片来源：网络）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将《大学》中的这些思想概括为“大学问”，以与以前那种“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的小学问相区别。与宋末比较，明末清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风已发生了大变化，如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乃至清末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等，都不再像宋朝的知识分子那样文武分离，而是主张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他们不仅学问好，而且习武，有的还领兵打仗。《资治通鉴》以及“四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经世致用、不务空论的认识方法，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

20 世纪 40 年代，这种认识方法又经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继承性改造，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延安学风”。这种学风有力促成了 20 世纪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美国崛起时也有培根的经验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崛起。

生死之地见真理。回头来看，当年毛泽东和王明开展的那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争论及其实践检验结果，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仍是一份极为珍贵并值得我们在未来历史中不断体会的思想遗产。而这次思想转折发生的起点，恰恰就是 1934 年底湘江之战的惨败。流血了，人就知道真理；面临生死，人就不空谈了。可以说，没有这次几乎是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全党就不会认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描绘血战湘江的油画作品（图片来源：网络）

17 世纪初，莎士比亚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摆到已来到世界新文明门槛的英国人面前，英国人民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由此还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在世界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门坎前也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开始从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向世界性的国家转变，在这个新征程中，“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并需要我们用新的方法去解决。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20 世纪 40 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仍是摆在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的任务。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领导人和国家公民。政治成熟，意味着我们的认识摆脱了“左”右两方面的“幼稚病”，诚如邓小平同志总结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的经验中学到可用于当今的有益知识。

1972 年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结果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

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尼克松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图片来源：网络）

尼克松说的问题，在当时既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也存在于中国。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当时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

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 1964 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此前两个多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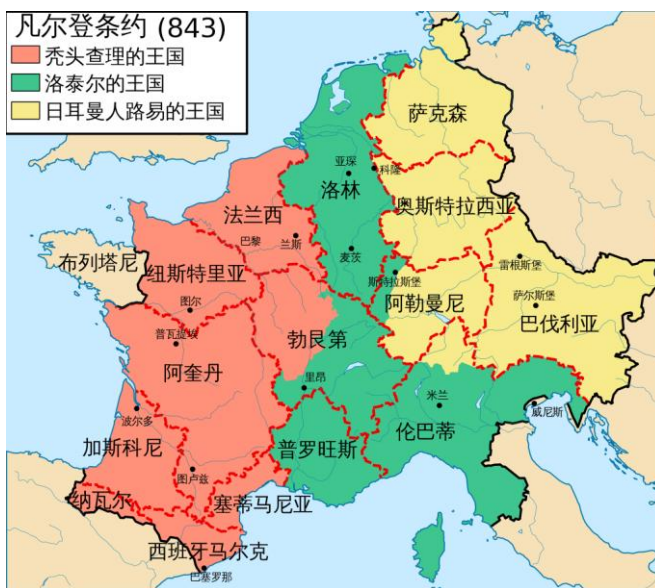
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宋、明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在研读宋明这段历史时，我常联想起奥地利。奥地利在 19 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 20 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

公元前 403 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侯，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 221 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

面对同样的事件，欧洲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公元 800 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被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 843 年用一纸“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

欧洲大陆的分裂及由此引发的各国混战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的崛起并称霸世界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20 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 40 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 1949 年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



《凡尔登条约》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新的历史条件使中国人不得不考虑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与西方人相比，我们还处于相当没有经验的初学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严肃思考 20 世纪初期奥地利和 20 世纪末期苏联所遭遇的厄运，以及为避免这种厄运在 21 世纪降落中国，我们应当担当些什么责任。

这样的责任感迫使我考虑写一部总结西方人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教训的“通鉴”式的著作——这是我撰写三卷本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初衷；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将写作的主要精力用于显示什么“新思想”，而用于证明某种成熟有效的经验，尤其是大国博弈中因决策失误而留下的生死经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显然，写这样的作品不是靠“登高一呼”式的热闹就能完成的。从2005年始至2010年底，我完成了本书的上、中两卷共150万字的写作和出版任务。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我仿佛听出当年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弦中琴音，意识到我们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在担当着民族复兴的责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本文是为拙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二版所作的序言，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原题为《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经作者重新审定后，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注释：

1. 张文木：《中国需要经营和治理世界的经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7期。
2. [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3. 阿利盖利·但丁（1265年—1321年），意大利佛罗伦萨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以长诗《神曲》留名后世。
4. [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1893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5. 《二程遗书》卷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9页。
6. [北宋]苏辙：《上皇帝书》，《苏辙集》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9页。
7. “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事苟不出于己，小有齟齬不合，则群起而噪之。”苏辙：《上皇帝书》，《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8页。
8. 宋代士大夫入仕的途径很多，诸如科举、资荫、摄官、特奏名、骨吏、纳粟以及从军补授，外戚推荐等。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宋代科举主要有进士、诸科两大形式。由进士科出身而位至宰辅者大大多于诸科出身。一般而言，进士录取名额较少，但大多为才智卓异之士，所以说“宋之得才，多由进士”。欧阳修谓：“自太宗崇奖儒学，骤耀高科至辅弼者多矣。盖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二十三榜，由吕文穆公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魏泰称：“本朝状元及第，不五年即为两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所以由进士出身，是士大夫擢升为宰相的一条主要途径。据统计，北宋从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始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凡167年有宰相72人，南宋从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开始至赵昺祥兴二年（1279年）凡153年，有宰相63人。其中进士出身的，北宋有63人，占总数87%强，南宋有48人，占总数76%强。可见宋代宰相以进士出身为最多。王翠：《从贵族到庶民——唐宋宰相家庭出身及入仕途径的比较研究》，载《文艺评论》2011年第8期。
9. 毛泽东读北宋策论时的批注。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
10. [北宋]苏辙：《上皇帝书》，载于《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0页。
11. [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萧涤非等著：《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

- 12.〔北宋〕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王仲荦等编注：《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97、398 页。
- 13.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做万恶之首并以此为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靡灭几尽”。（《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薛泽石主编：《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1 页）
- 14.南宋胡寅转述司马文正的见解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义少”。〔南宋〕胡寅撰，刘依平校点：《读史管见·旧序》，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3 页。
- 15.宋代以文学见长（比如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等）的政治人物甚多，而有政治建树的却极少。毛泽东读他们的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他在读马周给唐太宗的上疏时，想到宋人的策论，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读欧阳修的《朋党论》，他批注说：“似是而非”。读苏洵的《谏论》，批注说“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对苏洵所著《六国论》中提出的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并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读曾巩的《唐论》，毛泽东批注说“此文什么也没有说。”转引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93 页。
- 16.〔元〕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王仲荦等编注：《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91 页。
- 17.在这些政治家中，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偏爱。在他故居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了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护士孟锦云推荐《资治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 17 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薛泽石主编：《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59~360 页。
- 18.1863 年 4 月 9 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20 年比 1 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 1 天等于 20 年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8 页。
- 19.〔北宋〕苏轼：《题西林壁》，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9 页。
- 20.〔明〕王阳明：《大学问》，载于《王阳明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67 页。

21. 1954年冬，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接见著名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薛泽石主编：《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22. 邓小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23. [英] 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上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年版，第598页。
24.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338页。
25. 这是借用列宁“‘左派’幼稚病”的概括，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8~269页。
26.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27. [美] 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28. 徐景贤：《毛泽东曾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载于《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59/3649720.html>。
29.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30. 基辛格评论赫鲁晓夫说：“他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 [美]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31. 斯大林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页。
32.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33.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34. 《诗经·大雅·荡》，袁愈安译、唐莫尧注：《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35. 毛泽东非常重视秦王嬴政的这一贡献。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973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薛泽石主编：《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页。

36. 公元 843 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Lothar，约 795~855）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Charles Le Chauve, 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Ludwig der Deutsche, 约 804-876)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

37. 此借邓拓《过东林书院》的诗句并反其意而用之。1960 年 5 月邓拓参观东林书院时有感而发：“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下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参见张帆著：《才子邓拓》，海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5 页。